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七 ——
(二〇〇三年十月七出版)

本期目录 (zk0310b)

【以史为鉴】郭沫若说“焚书”	冯锡刚
【名流遇难】郭沫若晚年的遗憾	笑 蜀
【史海钩沉】关于郭沫若“焚书”说	翟清福
【见证历史】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训	金 秋
【人物追踪】吴法宪和他的妻子	图 们
【微观历史】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	佚 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以史为鉴】

郭沫若说“焚书”

• 冯锡刚 •

1966年的暮春4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文革”风暴即将降临。文坛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听取文化革命的专题报告之后，即席发言，检讨自己“实在没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衮衮诸公意料的是，郭沫若为表示自己从头改造的决心，竟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

郭沫若的这个检讨发言在4月底由《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为之震

惊，国际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层波澜。国人的殷忧自然无法诉诸传媒，而国际舆论却由此而获得抨击“文革”的实证。有鉴于此，郭沫若于7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出响应。郭沫若说，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郭沫若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烧掉”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了勉为其难的解释，并对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予以“回击”：

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藉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7月5日《人民日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的时尚。

攻之者说，郭沫若的发言为这场毁灭文化的大规模焚书运动做了舆论准备，难辞其咎；辩之者说，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并未真的烧过自己的一页书，此说不过是以“自诬”手段求得自我保护，应予以理解和宽宥。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历史的真实是，除了毛泽东，谁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权威。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焚书”说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对于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过甚其辞的说法，一般的文化人也并不就真的认为他要动手烧自己的书。郭沫若在这年5月间会见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着书橱中排列整齐的著作说：“你们看，书不是都还在吗！”1967年8月，郭沫若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时，正面解释了一年前在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致徐正之，《郭沫若书信集》下，409页）

这番解释印证了他会见日本友人时说的那番话。这样看来，郭沫若的“焚书”说并非物质意义上的焚书扬灰，而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从头改造。这在本质上也还是对虚无主义的认同和张扬。但是，这种“凤凰涅槃”式的“焚书”就没有自我保护的成份吗？郭沫若的挚友李一氓指出：他不是一位单纯的文学家和学术家，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熟悉历史上那些以自诬求自保的做派。这真是知人之论。一当形势变化，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就不再持“烧掉”的态度了。1972年10月，郭沫若亲自接待专程访华的日本友好人士，洽谈日本京都雄浑社筹划出版十七卷本《郭沫若选集》事宜。郭沫若对日方的计划表示同意和支持，显然是对六年前“焚书”说的否定。这拟议中的十七卷本的选集，几乎囊括了自《女神》以来的全部文学创作。看来，郭沫若不但不以为自己几十年来笔耕的几百万字作品真有付之一炬的罪行，而且还认为有传播海外的必要。

焚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焚自己的书，另一种是焚他人的书。焚自己的书，一般来说旁人不便置喙。如果说曹操烧《孟德新书》只是小说家的演义，那么果戈理将《死魂灵》第二部的

手稿在未付印前即自行焚烧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人对此除了惋惜，更多的是尊敬。郭沫若的“焚书”说虽也只是指自己的著作，却是屈从外界压力、投合错误思潮的违心之说。以“凤凰涅槃”来答复世人责难，似乎本是消除“误解”，本是表明心迹，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违心之言。

那么作为文坛泰斗的郭沫若，对“焚书”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中国历史上，开了焚书先例的是秦始皇。郭沫若对这个历史事件前后截然不同的评价，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1961年12月，郭沫若作《读〈随园诗话〉札记》，其第八节为《论秦始皇》，涉及“焚书”：《诗话》卷二第六二则，引罗两峰《咏始皇》云：“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袁枚以为“妙”。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于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古书！项羽乃楚国没落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孙，幼时“读书不成”，故不知文物之可贵。何能怪罪于始皇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742页）

项羽焚烧阿房宫连带着所藏的古书，自然是一大罪过，但其用意却并不在“整齐思想”。为着“整齐思想”而“焚书”，郭沫若竟认为“实有必要”。这种可怕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为五年后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埋下了伏笔。以笔者的推测，郭沫若当然并不真的以为自己的书要全部烧掉，但为着“整齐思想”，他人的有碍“整齐思想”的书就未必不能付之一炬了。事实上，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在读到郭沫若的检讨发言时的一个条件反射便是：以郭沫若这样“又红又专”的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书尚且要“烧掉”，自检以下，遑论其它知识分子的著述了。

郭沫若对秦始皇焚书的评价，据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序中所说，“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贯穿的是“今之意识”。郭沫若在1943年撰写《十批判书》时是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呢？

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十批判书》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在那个时代，郭沫若透过焚书事件，痛心疾首的是思想自由所遭到的“致命的打击”。相隔十八年，郭沫若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确实发生了“价值倒立”的转换。个中原委是什么呢？郭沫若1960年致历史学家翦伯赞信中的一段话透露了缘由：

“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郭沫若书信集》上，555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左右了郭沫若。毛泽东为秦始皇翻案，虽未形诸文字，但却有一段在大庭广众之下为“焚书坑儒”翻案的论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称赞“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当场驳斥林彪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责难：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转引自《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钱伯城文）

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当时一定听到了这个讲话的传达。他在次年3月写《替曹操翻案》时，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涉及“焚书”，但郭沫若不难领会其精神实质，故而在1961年的文字中作了“整齐思想”、“实有必要”的发挥。

郭沫若对“焚书坑儒”评价的倒转，只是对毛泽东崇拜的一个例证。这种崇拜一直伴随着郭沫若走到生命的尽头。1973年8月，毛泽东在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赋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认为《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因而在诗中还点明“十批不是好文章”。对此，郭亦赋诗表明心迹：“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如果说郭沫若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颐指气使、威逼利诱极为反感，以沉默表示抵制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批评从未抵触。1977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郭沫若赋七律一首，中有“九旬承教认孔丘”的感念。此前两个月，郭沫若在致林默涵的信中说：“《十批判书》，殊多谬误，望您不吝指正，以俾减少罪愆。”正可以作为诗句的注脚。

文坛泰斗说“焚书”毋宁是历史的悲剧。透过这历史的悲剧，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是太多了。

~~~~~

## 【名流遇难】

### 郭沫若晚年的遗憾

• 笑 蜀 •

—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闲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诗贵意境，《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意境没有。如果非要称之为诗的话，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

说出来怕不会有谁相信，这首打油诗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根据毛泽东

同志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文艺工作者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一百九十一行，怎不知当时的读者是怎么读下来的。至于郭沫若同样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

曾经写出了《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在他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理论、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在学术界一片荒凉的背景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可惜，这朵在寒冬盛开的“鲜花”没有给他带来声誉，反而只是无穷的遗憾。

先来看看这部著作的部份章节——

关于李白：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  
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麟东巡……

关于杜甫：

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

论者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1962年6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七十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率先“反潮流”，写就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他对写作此书的动机的解释甚至也与毛泽东的原话如出一辙——“四人帮”垮台不久，一位读者致函郭沫若说：“我总认为您对杜甫的论述是苛刻了。”郭沫若于1977年1月复信为自己辩护：“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其实，岂止一部《李白与杜甫》是为紧跟毛泽东。象前面讲到的郭沫若的《咒麻雀》、《宇宙充盈歌颂声》、《百花诗》等等，莫不是为了紧跟毛泽东。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即便在个人崇拜花样翻新的年代，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照样处于领先地位。郭沫若曾这样解释：

“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

郭沫若在用辞上尽量避免用“崇拜”二字，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还是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出来。

正因为如此，紧跟毛泽东，歌颂毛泽东，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其实还可以补充几个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种颂扬，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郭沫若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也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底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 二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

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笼不久，文革新贵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曾多次在小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认知。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主要指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从这种认知出发，他们枕戈待旦，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郭沫若首当其冲。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有的用辞还相当峻切，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两份内部刊物——《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则天》和《蔡文姬》的主张。这两份内部刊物郭沫若读到了。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郭沫若不安其位。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更是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内称：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辞职信则被列为“二月提纲”七个附件材料中的第四个——《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以证明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所谓“学术讨论”打击面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关于这个提纲的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郭沫若没有可批之处，郭沫若毕竟有“过”。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紧接着的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郭沫若的大部份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仅仅四天之后，就诞生了震惊中外的郭沫若检讨书。

和郭沫若一样被毛泽东提名为保护对象但要作“自我批评”的范文澜，其时的举动堪作郭沫若检讨书的一个注脚。1966年5月6日，翦伯赞致函同事刘大年和黎澍，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文澜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是范文澜的心态，也是郭沫若的心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惊中外的检讨——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为了使别人无可再补，郭沫若干脆一点余地不留，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的这番高论，正中好事者下怀。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通过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光明日报》不敢怠慢，立即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秘书答称：需请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发表，目前他在地（此时郭沫若刚回四川），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说。康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检讨书送到了毛泽东案头。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无需郭沫若本人许可，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见报；郭沫若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就仿佛是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尤其在文艺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国内知识分子为之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苏联、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自不免就此说东道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要拿郭沫若的检讨大做文章。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检讨无疑为这些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证。郭沫若的个人形像、中国的国家形像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没料到到自己的即席讲话会在全中国所有主要传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来，更没有料到会有此种反响，一时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他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份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两个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发言，



坦率地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算是对国外舆论的一个回答。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烧书”的主张又做了一种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更遗憾的是，像这种最大的败笔，在郭沫若并非下不为例。

### 三

郭沫若4月14日检讨的目的是争取主动，求得自保。但他没能如愿。他的检讨非但没能成为保护伞，反而给别人提供了炮弹。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以郭沫若为主角的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曾写下一首小诗，记述此事：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金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飭令严。  
限期交代，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其实哪有什么“受之甘”，不过是无可奈何罢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一位新闻界人士称：“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而纯粹是高层煽动的——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虽然出席了大会，却备受冷落。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身为中国文艺界领袖，郭沫若竟没有发言资格。这等于是告诉公众——郭沫若已经靠边站了。纪念大会过后两天，即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全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国中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说：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地冲击郭沫若。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团第一排，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却被安排在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豪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应该算郭沫若一生中最苦涩的作品了。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说：“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地前进。”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像”。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郭沫若自尊心、自信力的彻底丧失，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自尊心、自信力的彻底丧失，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向政治强权竖起了白旗。就这个意义而言，郭沫若的这个败笔，既是郭沫若个人的败笔，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败笔，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耻辱柱。

有了这样的败笔，再有其他什么样的败笔，也都无足为奇了。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一直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毛泽东看来，郭沫若算不算共产党人，似乎已经成了问题。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五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迭遭重创的郭沫若，现在再度置身风口浪尖，其惶恐惊惧可想而知。他还没喘过气，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郭沫若似乎就要没顶了。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高层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这时郭沫若已恶疾缠身。但他还是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诗云：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本来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当时万万不会料到，这篇文章既使他不见容于蒋介石，又在几十年后获罪于毛泽东。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毫无保留地推翻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并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的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敢也不能怀疑那场“革命”，只能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儿子的死，多半也因为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却不能对致他的爱子于死地的那场“革命”有半句微词，反而还不能不以中国第一文豪的身份，不断地奉命讴歌那场可耻的“革命”。人世间还会有比这更屈辱的事吗？

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郭沫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与世长辞了。他究竟想了些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端倪可寻。四人帮刚刚倒台，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直到今天才见天日。在这首诗中，郭沫若又焕发了《女神》时代狂傲不羁的精神，说“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发誓要仗剑走天涯，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可惜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那个亲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书面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遗憾。

□ 摘自《今日名流》

~~~~~  
【史海钩沉】

关于郭沫若“焚书”说

• 翟清福 •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份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

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

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导。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感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 原载《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

【见证历史】

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训

• 金 秋 •

〔译者丁凯文注：金秋女士为中国将门之后，其父即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金秋女士1995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博士学位，并出版《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英文版，1999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金

秋女士现任教于佛吉尼亚州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历史系，为该系副教授。此篇文章 2001 年刊登于该校学报上。历史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记忆他们自己的过去？政府和社会是怎样基于被扭曲的事实来书写一部可信的历史，而这些被扭曲事实又恰恰是不少人所亲身经历过的呢？）

作为个人，自己经历了从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向一个学者的转变，而这段个人经历在大的历史环境中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因素。尽管这一转变是很困难的，但我却相信它是必要的。

我所写的事件就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所发生的林彪事件，它改变了中国许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因此而受苦受难，许多人甚至至今仍深蒙其难。

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星期我的父亲消失了，在以后的 10 年中我们丝毫没有他一点消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我的母亲和哥哥被关押多年，然后被押往偏远的农村做苦役。我的姐姐和我也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一待就是很多年。我的妹妹，一个 13 岁，一个才 11 岁，也被迫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流放”生活以及父母亲的消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维生。

从我个人和职业的角度来看，我应该承担起历史见证人的责任。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却将自己放在一种两难的处境。作为历史学家，有人会批评我对历史的解释含有太多的个人的因素，太主观，太任性以及太有偏见。作为这个受苦受难的家庭的成员，我也许被批评为揭露得还不够深刻。对中国政府的大小官员们来说，无疑我已被看成为异见分子。

## 1. 历史不容歪曲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来美国却钻研中国历史。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为了研究林彪事件。对我来说在中国从事这一研究不仅毫无可能，甚至还很危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林彪事件仍然高度敏感，中国政府仍然绝对禁止研讨这个题目。因此我在 1989 年来到美国后，在校七年集中全力于林彪事件，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并出版了专著。

为什么这一特殊事件如此重要，以至我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予以研究呢？

凡经历过大陆 60 和 70 年代的人一定对文革和林彪这个名字不感陌生。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在文革前夕就已地位显赫。当毛在 1966 年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林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的副主席。此后，林伴随着毛出现在每一公众场合，手摇毛的“红宝书”语录。

当毛泽东利用林彪实现了他的个人意志后，毛无意中给世人造成了林彪一贯紧跟的形像。在 1966 到 1971 年间，当所有中国人举世高喊毛主席万岁时，还要高颂“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谄媚，毛林之间产生了紧张，特别是 1970 年 8 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相信正是由于毛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林彪一家步入黄泉。

林彪一家在中国著名的海滨度假地——北戴河渡过了他们的最后日子，紧张地等待毛对林日益迫近的清洗。在 1971 年 9 月 12 日傍晚，林的家庭庆祝了女儿的订婚，还招待他们看电影。当晚 9 点之后情况突变。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北京回到北戴河，告诉他母亲叶群毛在八月中旬和九月初南巡途中针对林彪和其家庭的谈话。毛在谈话中明白地表示对林在庐山的二中全会上与江青争执的不满。

毛相信林并非无条件地紧跟毛的指示，并由于林系大将领们拒绝接受毛的批评以及林坚决不做自我批评，使得毛越来越恼火。

尽管林彪对毛的步步紧逼不满，但林并未企图予以回击。作为第一代的革命家，林对毛的反应是典型的君臣性质，即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对毛泽东的虚幻的忠诚。对他们来说，没有毛就没有这个党，没有党就没有他们的一切。

然而这个家庭其他成员因参与反毛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林对党和毛的这种忠心限制了林的行为，但这种忠心对林立果这位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却毫无作用。

当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与他的亲信们讨论反毛一事时，我相信林彪根本不知道他儿子的所做所为，至少在开始时是全不知情的。即使假设他在9月12日晚最终知晓时也已为时太晚而无法挽回林立果的言行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林立果的同事在根本不知道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时就向当局报告了这些反毛的言行。看来，即使是为了保护儿子林也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北戴河。

## 2. 历史的代价

我不清楚林彪的飞机为何会坠毁。它也许已被人为地破坏，也许失事纯属偶然。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一事件导致了中国一场最大的政治危机，也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前中共政权面临的最大的政治事件。在随后的报复中，毛清洗了1000多军队中的高中级干部，更多的下级干部则广受牵连。

913事件后，中共当局强烈指控林彪试图暗杀毛泽东，阴谋分裂中央和策划未遂政变。根据官方文件，这些阴谋失败后林和其一家逃跑，试图飞往苏联以致飞机坠毁。

然而，尽管炮制出这些强烈指控，但中共当局并未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些指控，在三项关键之处也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林作为解放军的常胜将军跟随毛几十年会选择和毛的其他部下截然相反的方式突然试图搞儿戏般的政变？当所谓的政变失败后，为什么林选择去苏联？为什么林彪的座机会坠毁？

令我下决心研究林彪事件并非是什么政治上的原因，而是来自家庭和个人的因素。我的父亲当时就任空军司令，是毛在林彪事件后全面整肃下的第一批高层牺牲者。他的失踪和后来长期杳无音讯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死活。1981年我的父亲忽然被送上了政治“审判”台，与毛的夫人江青一起被指控要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负责。他被所谓的“法官”判了17年有期徒刑。

在中国，一个家庭成员被宣判政治上有罪，他的整个家庭就全都有罪。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母亲、姐姐、哥哥和我或被逮捕，或被驱赶到偏远的农村。我还看到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在这场清洗中是如何深受其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永远无法平息他们所经历的伤痛。

## 3. 秉笔直书

我来到美国时带有强烈的愿望，即要找出林彪事件的真相。我从不相信当局对林彪和我父亲的指控。如果我只是简单地接受当局的这些关于林彪事件的“标准化的说辞”，那对我的家庭、我的朋友们以及那些成千上万的受害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我相信这些“标准化的说辞”不仅是中共当局迫害异己的藉口，而且也是当局如何解释历史的典型事例。

林彪事件对中国的政治和对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处在家庭和国家政治之间的缝隙中的人。林彪事件恰恰说明了在某种环境下一个家庭的危机可以直接导致国家的危机。

对有关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扭曲的政治势力的活动，林彪事件的研究也提出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它清楚地显示出中共当权者在毛泽东时代是如何操纵政治思想的。当局使用几乎同样的证据制造出假的说辞和全然不同的解释，强迫那些被迫卷入事件的官员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并仅以部份证据指控他们，在没有任何质疑的情况下将“官方的说辞”灌输到公众的脑海中去。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曾怀疑过当局对林彪事件的解释。

三年前的夏天我去了杭州，实地参观了一处所谓的“展馆”，即当局指控林策划反毛时林在杭州的行宫。我在所谓的林彪的“办公室”、“卧室”和一个名为“将军楼”的小楼前照了几张像，这个地方正是所谓的1971年我父亲和其他将领们参与林彪策划反毛之处。我清楚地知道林彪和我父亲从未驻足造访过此处“行宫”，但是每个参观者都被告知这就是林彪的“阴谋”，这座小楼和其展览为当局的指控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有人会对这秉笔直书吗？500年之后再来此处的参访者会怎么看林彪事件呢？他们还会对官方所述林彪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丝毫疑问吗？我感到乖张的是这么多人为之受难的事件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一部份人的发财捷径。

从一个曾亲身经历历史和深受其害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实是个人和集体的悲剧。作为一个作者，我愿让读者来做判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相信真相终有大白的那一天的。

~~~~~

【人物追踪】

吴法宪和他的妻子

• 图 们 •

〔本文摘自图们所著《震惊世界的七十七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一书。作者图们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员。——编者〕

当吴法宪出现在法庭上时，其妻陈绥圻还在浙江省绍兴县龙虎山林牧场劳动。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日，陈绥圻由中央专案组审查。一九七八年经中央批准，结论为“林彪死党，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鉴于罪行严重，属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空军送浙江小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有关部门将陈绥圻移交给浙江省，由该省公安局将陈送到绍兴县龙虎山林牧场监督劳动。当吴法宪接受中央重新审查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通知吴，陈绥圻的问题由空军重新进行审理。

一九六八年五月，由叶群提名，军委办事组下达命令，将本来不是军人的陈绥圻从民航总局调到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并成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此时，吴法宪已被林家重视，叶群调她来就是“替吴法宪管理好家，巩固后方”。

叶群在陈绥圻到空军就任后，很关切地拍着陈绥圻的手，像老朋友一般，还谈了一些妇女更年期的事情……。此后，林家经常要交吴法宪办一些很“绝密”的事，由她当他办公室主任，

叶群就放心了。

对于叶群的关心，陈绥圻同其他被告的家眷一样，有些受宠若惊。

试想，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战功卓著的战将们如同一条璀璨星河里的星星，吴法宪在其中不过是普通的一颗，假若不抓住林彪这样的绳索来攀上更高的权位，他和她很快就要暗淡无光。在此之前，陈绥圻知道，丈夫为了靠近这条绳索不知低过多少次头，接受过了多少人抛来的蔑视的眼光。就在他人脊梁快被人捣出茧子的时候，叶群给予他们如此恩惠，她有什么理由不拥抱这一切呢？为了自己的老头子，为了这个家，她要向林家献忠心。

一九六八年五月，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陈绥圻的激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她在自己亲笔给林彪、叶群写信：“您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永生难忘……”。此后，她给林、叶的信中，不断出现这样的语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包含着您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庄严宣誓，一定以您为榜样。”“永远忠于副统帅林副主席，海枯石烂志不移……。”

一九七零年六月，陈绥圻接到一个电话，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来的，胡萍报告陈绥圻，林立果要在西郊机场找房子，陈绥圻听前一喜，她知道，林家的事能摊上谁办便是谁的“幸运”，她满口应承下来，当时就指示：“太好了，你好好安排一下，一定要搞好一点，注意安全，注意保密。他们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们好了，我们对林副主席的忠心就是要从行动中表现出来。”

后来，她又亲自过问这件事，西郊机场对林立果的住房进行了装修，林立果需要什么，真是应有尽有……。照顾好林家的“少爷、千金”这是陈绥圻以一个女人的敏感窥视到的接近和报效林家的一条捷径。

林彪把儿子、女儿放到空军，自然为吴法宪和陈绥圻讨好林家创造了条件，这是条件，也是优势。她知道，林家的吃、住、用基本上是邱会作这个总后勤部长和他老婆胡敏包揽了。在这一点上，她不及胡敏。靠近林彪的黄永胜和项辉芳也有其优势。她知道叶群这个情欲横流的女人与项辉芳有距离，她利用项，还得哄着项，原因是看中了项辉芳的男人。如果项不为此与她争风吃醋，就算项辉芳为她贡献了一个男人……。除此外，许多事也被李作鹏和老婆包揽了。于是，陈绥圻和吴法宪便抓住机会，要尽心照顾好林立果这只“老虎”。

“老虎”的“虎”比林彪的“彪”尽管少了三撇，但“老虎”绝不是等闲之辈，大有“子随其父”的劲头。林立果到空军后就拉起一帮子人，尽管林立果才二十出头，与他同龄人相比，他显然是富有心智，加上他见多识广，陈绥圻明白把他捧起来，有百利而无一弊。吴法宪后来抛出的“两个一切”，她没少在枕边吹风。

一九七零年七月六日，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陈绥圻便推波助澜。她发言道：“这个问题很重要。林立果对空军建设非常关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林立果是天才、全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十多天后，在吴法宪、陈绥圻等人安排下，林立果在空直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所谓活学活用的“讲用报告”，陈绥圻带头喊起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口号，一连喊了十七句，嗓子都喊哑了。除此之外，从一九六八年开始，陈绥圻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伙同吴法宪等人，从空军派出二十多人，以选“外事工作人员”为名，在全国各地为林家挑选“美女”。

陈不仅组织、指挥，掌握了“选美”情况直接向林彪、叶群汇报，还亲自到北京一些地区选美，并把她的家作为叶群的“审美”地点。

一九七一年夏天，一名叫吴统成的军人发现了林立果在广州进行阴谋活动，向空军党委写信。

陈绥圻不加思索地当即扣压……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男女婚姻的夫唱妇随是一种美德。假若用这一点来评判吴法宪和陈绥圻的感情，他们无疑是一对“模范夫妻”。这一点或许叶群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才和林彪把诬陷迫害罗瑞卿等老干部的任务、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吴法宪。或许正是因为这对“模范夫妻”的夫唱妇随，吴法宪才对她表现出忠贞不二的感情。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这些被告中，吴法宪的生活作风是相对检点的，他对陈绥圻也是关心的。据说有一次陈绥圻生病，吴法宪守在病榻前流出了眼泪，包括吴法宪在狱中的表现和牵挂，也正是说明这一点。这样似乎为中国的传统婚姻找到一个支点，那就是只要结合，男女之间便有了共同的利益。只可惜，他们的根本利益只为一个“权”字！陈绥圻和吴法宪为了权，权力使他俩默契如一，权力使他俩狼狈为奸，权力使他俩“恩深似海”。但也就是权力使他俩各奔东西。

“九·一三事件”前夕，陈绥圻还在筹划约王辉球、王秉璋、曾国华、邝任农、刘锦平以及他们的老婆到林彪家接受叶群的接见并请他们看电影。陈绥圻提供给叶群受接见的人名单，这样既替叶群联络了部下，又替丈夫疏通了在空军主要同事的关系，这是她这个吴办主任工作的一部份。

到了九月中旬那段让他们紧张的日子里，种种恐怖的信息，使她必须像看一场梦一般来看待昨天。她开始烧毁一切与林彪、叶群有关的证据，包括林彪、叶群讲话的记录本，林家送给吴家的条幅等。

做完这些，夫妇俩度过一段清冷的日子。他们都清楚自己的结局，彼此对剩下的时光感到珍惜。前几天，吴法宪受周总理之命到西郊机场处理禁空事务时累坏了，陈绥圻便让他躺着为他按摩身体。

陈绥圻气喘吁吁地为按摩，吴法宪的泪水打湿了枕布……。

此时，他俩最担心的是五个孩子，他们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在部队，长女吴仲秋在北京内燃机厂当护士，余下的三个女儿都在上学。过去夫妇俩拼命地为权力而争，现在，权力像一朵云彩飘然而去。如今命都难保了，还怎么庇护这几个孩子呢？

吴法宪在大势已去临被接走去人民大会堂之时，情不自禁地凝视着身边的孩子，孩子们还不知道他这一去再难回来，最小的女儿起床晚了，怕上学迟到正伏在餐桌上风卷残云一般吃早餐。他想多看她一眼，可她一直埋着头，只有小嘴里传出呼呼拉拉的声音。他心里一酸，这才明白陈绥圻曾经嘱咐他“一定要活着回来”的意思。

车在门口已经发动，他向门口走去。这时，小女儿问他：“爸爸，星期天去不去颐和园？”去颐和园，这是女儿说了好久好久的话，他一直脱不开身，他这时突然感到做一个老百姓也是很有意义的。要是能让他过几天老百姓的日子多好啊……。

“……。”吴法宪想说什么，但喉咙已经噎住了。吴法宪上车走了。陈绥圻似乎明白了他最后一眼的全部内容，那眼神成为在她心目中定格了许久的特写，但她在三十六天后，也失去了

自由。

在人们的印象中，吴法宪是最怕死的，他怕死是因为有陈绥圻和他的五个孩子，对陈绥圻的爱怜和对孩子的歉疚使他要争取活下来。一九八零年夏天，孩子们来探监。他得知陈绥圻已经从农村回来，而且空军党委已明确指示：“吴法宪的女儿考大学不受吴法宪的影响，考得上就上。”

他的女儿吴金秋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三女儿吴梦瑾考上了北京无线电技校。他彻底相信了党的政策，他是五个主犯交代材料最多的一个。

陈绥圻在那段接受改造的日子里也活了下来，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长达九年的改造，劳动使她认识了许多东西，包括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意义。

农场每月发给她五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她节俭地生活，回到北京时还给孩子们带回了一点积蓄。

她是从广播中得知审判吴法宪的。此后，她每天五点钟就早早起来听广播。当听到吴法宪还能保住性命的宣判时，她振臂高呼三遍“共产党万岁”

吴法宪有一子二女住在广安门车站东路十五号，其子吴新潮从部队复员后，原分配在湖北荆州，他带着户口没去报到。在闲居的生活中，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自己在当地的户口和安置工作。此要求在审判吴法宪结束后就得到了答复。审判前夕，他还要求给父亲当辩护人，但是在探监时被吴法宪劝阻了。

审判的日子里，他们三人保持了沉默。

陈绥圻在吴法宪判刑后不久也得到处理，空军政治部根据中央指示，经审查复议，给陈绥圻定为行政十六级，作退休处理。

不久，吴法宪活着同她见面了，他同陈绥圻在山东济南市过着他们向往了十来年的平常人的生活。

这时的陈绥圻已是一个对他体贴入微的家庭主妇，吴法宪从她那里找到早年失去的许多东西。

□ 摘自《震惊世界的七十七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

~~~~~

## 【微观历史】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

• 佚 名 •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他，他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

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在此前后，刘亚楼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触。苏德战争爆发时，两人经常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国际军事领导人集会，为苏方献计献策。刘亚楼那个未被采纳后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更使林彪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主官。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不管刘亚楼接受不接受这种“教条”，但从林彪不爱给部属题字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刘亚楼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张夫人参政，他的脑子里也许有种“轻女”思想。当林彪问为何不让翟云英当办公室主任时，刘亚楼非常直露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夫人参政会出乱子，弄不好会栽在夫人手里。

##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党中央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对毛泽东无条件信任的刘亚楼，自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赞赏这些主张的态度，何况那时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刘亚楼列席了林彪主持的军

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明确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一脸不高兴,立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吭声,见没有人发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又补充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还没等罗荣桓说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著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其间,他几次去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和他作了促膝谈心。这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刘亚楼多次前往探望。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死神的阴影终于笼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

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们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当罗瑞卿接到刘亚楼病危的报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前往看望。到了刘亚楼的病房，护士怕传染，给他们口罩，可罗瑞卿却摇了摇头，他不能戴著口罩给自己的战友送行。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已陷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望著来到身边的罗瑞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披肝沥胆的话，令杨成武和在场的医生护士莫不感动流涕。所有见过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刘亚楼最后会“揭发”罗瑞卿什么“四条”的传言。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嘴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庖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干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份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党史博览》）



□ 原载《党史博览》作者不详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